

第一章 “中国对西方之 回应”症结何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味着另一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active）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reactive）角色。对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主张最力的著作之一是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1954年）。在此书序言中他们说：“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她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

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 展开进攻 削弱它的基础 乃至把它制服。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她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1〕

“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也是另外一本发行最广的战后教科书的核心概念，此书是保罗·H·克莱德(Paul H. Clyde)与伯顿·F·比尔斯(Burton F. Beers)合著的《远东 西方冲击与东方回应之历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作者在该书 1966 年版本中说：“过去一百五十年，东亚一直是一场革命的舞台，这场革命的广度与深度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两个伟大的运动。第一个运动是西方文化生气勃勃地向中亚与东亚的古老传统社会全面扩展，这个运动从十九世纪初开始 通称‘西方之冲击’。到二十世纪初 就政治权力而言，它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不过此时这场革命的第二部分已经相当深入地展开。亚洲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开始是软弱无力 步调参差 方向不明的。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已是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到二十世纪中叶因为出现了一个个崭新的东亚。”〔2〕

尽管克莱德与比尔斯一书把冲击—回应模式应用于整个中国近世史，但其他著作大都把这一模式集中应用于十九世纪。最典型的例子是由费正清，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和艾伯特·M·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的《东亚文明史》(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此书第二卷中有关十九世纪中国的论述主要出于费正清手笔，集中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对外国的入侵没有较早地作出更加有力的回应？”由于把

这个问题作为中心问题，费正清的论述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向或歪曲。首先从数量上说，他把过多的精力（大约75%的篇幅）用于这段历史中与西方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其次，由于主要是通过冲击一回应模式这个棱镜来观察这些侧面，致使对它们的复杂历史涵意未能作出充分阐述：有些事变本来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却被过多地说成是对外来冲击作出的回应。第三，费正清为了要说明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不得不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3〕这一说法来勾画——也可以说是来歪曲丑化——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面（诸如中国的政权结构、社会经济与思想等方面）。

尽管作为严肃的学术分析框架，冲击一回应取向的鼎盛时期是在五十与六十年代，但是它对教科书和其它大学教学资料的影响则至今不衰。在有些情况下，例如《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一书，是因为原书一直未经修订。〔4〕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尽管修订版不断出现，第一版的总思想框架却从来未作修改。例如克莱德与比尔斯的书，费正清、赖肖尔与克雷格的书，以及另外一本流行甚广的教科书即梅谷（Franz Michael）与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合著的《近代世界中的远东》（*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都是如此。〔5〕总之，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与初学者所得到的中国史画面之间存在着一个差距。

其实，这一画面的主要毛病并不在于它是“错误的”，而在于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待清楚。就像在物理学领域，过去百年的发展尽管没有推翻牛顿定律，但却表明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冲击一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像上述诸例设想的那样足以说明全部问题。〔6〕

冲击—回应框架存在的问题

除了适用范围这个总问题之外，冲击—回应取向还有一系列具体问题。问题之一是在谈到‘西方冲击’时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我们中间不少人意识到自己对‘非西方社会’的了解比较肤浅而自惭形秽这是应当的。不过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对西方这块故土已经了如指掌。其实正如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所说：“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近代西方本身时，这种虚假的一目了然的现象迅速消失。我们认识到十九、二十世纪的大师们殚精竭虑地探索近代西方事变的内在含义时往往众说纷纭相持不下……当然我们对西方所‘知道’的〔比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于我们，西方和过去一样依然是迷惑难解的。”〔7〕

西方之所以如此迷惑难解，理由之一是近代西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中国所遇到的西方，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时对中国思想、政治生活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西方同样都是“近代西方”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别。西方在近代阶段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这个明显的真理却容易被人忘记。

同样容易被人忘记的事实是“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词汇里也不会出现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倘若西方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则“西方”所包括的地域中种种空间的划分就自然会在我们的脑中突出起来。这时，法国和美国的区别很可能就变得和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同样巨大。如果按逻辑推论，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美国也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我们感受到的差别就会完全集中在“美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下列看法，即“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就以十九世纪后期的上海为例，它和具有典型中国风貌的内地相比似乎是“西方化”了。但是它的行政制度受英帝国的控制，它的经济高度商业化，它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它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文化具体而微的代表，正如纽约城不能作为整个北美文化的具体而微的代表一样。同样，在看待二十世纪前期这段历史时，如果通过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冲击的概念来分析问题，也将是荒谬可笑的，尽管在这段时期几乎每个西方思想流派都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找到鼓吹者。甚至当中国人谈到‘全盘西化’时，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也并不是用西方的社会与文化来机械地代替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是按照经过精选的、他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来改造中国。例如胡适（1891—1962）就只希望采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反对中国采纳西方的基督教；而且，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民主都带有明显的杜威学派的烙印，不能一般地代表西方类型的科学与民主。

因此像中国这类国家所接触到的“西方”，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且即使这一部分在接触的过程中也逐步蜕变。例如，十九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可能不是很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他学习中文、采纳某些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新的环境接触交往，开始经历一个‘杂交’的过程。他已经不是单一纯粹的西方人，变成了‘在中国的西方人’（*Westerner-in-China*）。尽管和他接触的中国人仍然把他看成洋人——当然他还应当算个洋人——但是由于他对中国这

个异国环境产生了回应，就使中国人心目中的“洋”也带上了他所特有的色彩。因此单纯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来解释所发生的现象是不够的，因为其中还含有一种西方对中国冲击所产生的回应。

在思想概念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杂交现象。概念不像人，不能对环境做出积极回应，但是概念的含义起码部分是由环境决定的，因为概念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产生意义，而某一概念对某一人的含意是受表达这一概念时各种环境条件所深刻制约的。所以，说什么对于诸如国家主权、基督教和进步等概念直接做出中国回应是没有多少意思的，因为在这些西方概念能够引起回应之前，首先得进行交流，而交流只有通过中国语言及其思想方式的过滤才可能实现（这里所谈的，当然不是直接通晓西方语言的少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人）。这种过滤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原义的歪曲。（例如“liberty”或者“freedom”被译成“自由”但“自由”就字面的含义而言是“由自己”难免带有放任或无视法律的色彩。其实使大多数中国人做出回应的正是这种经过歪曲的本土的说法，而不是外国原有的说法。〔8〕

这种西方的首次冲击，当它经由中国人传递时，还会受到另一种歪曲。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外国商人与买办之间，或传教士与教徒之间，西方的冲击多少比较直接。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并非如此。当基督教是经由中国起义者加以传播，或者西方的制度是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西方冲击就和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或者不只一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此后，冲击—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还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清廷对太平军叛乱的回应，保守派和温和改革派对戊戌年间改革的回应，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人不熟知的西方挑战所引起，但同时也是由

于中国人所熟知那一套叛乱与改革的挑战所引起。如果把这些回应简单地说是成只是对西方的回应，那就会造成极大误解。

另一个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在每个特定地区，少数上层社会人物（the elites）*与广大群众之间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区别。即使在这两大社会阶层内部，正如在一切人类集团内部一样，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包括气质、性格、年龄、性别以及由个人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关系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况。所以“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当然，在某一层次上说，所有中国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乡下人，穷人、富人，广东人、湖南人——都参与一个共同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统称为中国文化体系；但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些人的经历却千差万别。每个从属的集团进入较大的中国文化时，角度都不相同，正是这种不同左右了他们如何对各种情况做出回应。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回应统称为中国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把各种现象加起来，再加以平均。这种做法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使我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在最坏的情况下，由于我们鲁莽草率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现实完全歪曲了。

简而言之，中国在前一世纪对西方回应的这段经历，必然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尽管具有历史的重

* “elite”意指在社会上处于比较优越地位的、精选出来的、有影响的少数人，以别于一般群众，它比“士大夫”所指范围较广，有的译为“社会精英”，本书暂译为“上层社会人物”或“上流社会人物”。——译者注

要性，但与西方冲击并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另外一些事情则虽然直接或者间接受西方冲击的影响，但决不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主要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如果我们把“回应”理解为有意识地去解决冲击所造成的新问题的话）。对上述第一类历史事变本书将在第四章加以讨论，本章将集中探讨第二类历史事变，其目的是说明冲击—回应取向，作为理解历史的指针，即使在理应最适用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局限性。

晚清历史与西方有关联的方面

叛逆运动

就直接影响清廷地位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变，并不是散居蜷缩在沿海小天地中某些西方人的恼人行为，而是内部的骚乱。除了许多地方性的暴乱外，有四次规模巨大的叛乱：云南的回族暴乱（1855—1873），西北的另一次回族暴乱（1862—1873），捻军（1853—1868）和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它也是破坏性最大的叛乱，曾使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一片苍凉，丧生者估计达两千万到四千万之众。诚然，太平军是十九世纪中叶受西方入侵影响较大的唯一叛乱运动，但是如果像许多教科书那样^[9]采用“中国对西方之回应”这一比较笼统的框架来分析这个运动，则其效果如何却是另一问题。现在让我们较仔细地回顾一下这个运动的历史及其性质。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是华南，那里有利于叛乱的条件可能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成熟。南方是满清十七世纪征服中国的最后的地区，一直是清廷政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十八世纪末叶由

于人口过剩及租佃制度不合理给这地区增加了巨大压力。除此之外，正是在华南，中外贸易与鸦片战争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瓦解作用也特别明显。原来的贸易体系发生了变化（例如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重心从广州转移到其他港口）海盗横行 走私货物侵入内地 这一切都打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与此同时英国人打败了满洲人引起广东人的仇外恐外心理（xenophobia）并使这种心理带上浓厚的反满色彩。不管在 1850年前西方冲击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如何肤浅表面，但是在华南一带这种影响却是真实而深刻的。

太平天国的奠基人及其前期领袖洪秀全就在 1814 年生于华南，距广州约三十英里。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是客家人，而客家人虽然早在若干世纪前就移居华南，但由于具有独特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仍然和周围社会隔离开来。洪秀全由于是全家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得有机会读书，并能多次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每次都名落孙山。在一次落选之后 他精神恍惚，一病四十天 后来自称就是在这段生病期间，眼前出现过异像。1843 年他再度落榜后，读了一本前几年别人给他的基督教小册子，并首次理解了这些异像的含意。他开始深信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受神的旨意 来消灭世上的鬼怪与偶像 在人间建立“天国”。

洪秀全和他另一位科举落选的朋友开始深入两广宣传教义。他们的徒众主要是一些不满现状的农民及秘密会社的成员，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松散的团体叫做拜上帝会。四十年代后期该地区天灾人祸，盗匪横行，迫使这一会社采取武装自卫。但是他们自己和盗匪的区别也一时难辨，加上当时华南四处骚乱，很快他们就卷入了一场和官兵相抗的斗争中去。事态不断发展，到 1851 年正月他们终于举起了反抗朝廷的旗帜，洪秀全号称天王，建号太平天国。

太平军向北挺进 在官兵节节失利下 连战告捷 直抵长江 接

着挥师东指，于 1853 年三月定都南京。这座城市直到太平天国 1864 年覆亡一直是这一运动的政治中心。在五十年代初的北进过程中，太平军从一个很小的地区叛乱发展成一个人力物力都十分充足的规模巨大的运动。尽管叛军控制的中心战场一直是中国的东中部，但在十五年的战争中其影响却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五十年代中期，一支北伐的远征军在被迫折回前，曾直逼天津；六十年代初期，当叛军主力向沿海推进时，上海曾几度遭受威胁。

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太平天国运动中最革命的方面是它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10〕}太平军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由福音的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性的禁欲主义与儒教* 乌托邦主义 (Confucian utopianism) 熔冶而成的奇特的混合物。他们的先进的社会、经济教义 (包括对鳏寡孤独的扶养保护) 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人类平等相爱的思想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是由奉拜上帝为父这一信仰推演而来。妇女与男人完全平等，可以参军作战，可以参加政府考试 (虽然此点证据尚嫌不足) 并担任官职。这种女权主义还表现在禁止缠足、娼妓、多妻 并规定在土地分配上男女平等。此外，太平军还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动产也理应归公并按照需要重新分配。

太平军的政治目标是推翻清朝，建立新朝代——这个朝代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新的。他们的政治、军事组织以周礼为蓝本，周礼据传是记载周朝早期行政制度的一部中国经典著作。高踞太平军政治组织顶峰的是天王洪秀全。最少从理论上说，不论

* “Confucianism”一词本书暂译为“儒教”或“儒教思想”。因按西方学者用法如译为“儒家思想”或“儒家学说”均嫌含意稍狭。但此处译为“儒教”未必都含有一般宗教之意。故“Confucian”一词作为形容词时仍译为“儒教的”，有时也译为“儒家的”，作为名词时则一律译为“儒家”。“Neo-Confucianism”一词则一般译为“理学”。——译者注

在精神或世俗领域他都是至高无上的。洪秀全的左右最初有五“王”。诸王在各自管辖的地区拥有充分的民事与军事权力。在这最高层领导下，有一个由次要军事指挥官所组成的多层次机构，他们同时担任所属单位的军事、民事与宗教的首领。这套机构主要是洪秀全的第一副手杨秀清（死于 1856 年）设计的。梅谷曾把这套机构称之为“极权主义的”，认为它提供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体制”。〔11〕

上面这段概述足以清楚说明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太平军起义势必大为改观。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加上华南地区对贸易的破坏作用都促使社会分崩离析，形成产生叛乱的背景。叛军在意识形态上向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提出的革命性挑战最少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基督新教。起义的后期最高领导人之一洪仁玕（1822—1864）更是直接接触过西方文化。而且，在六十年代初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江苏省）英、法两国的军队（由西方人率领的雇佣军（特别是“常胜军”）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现代武器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在任何重要意义上，我们仍然不能把它看成是针对西方作出的回应。这个运动的矛头不是针对西方的，它不像有些通俗读物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想把中国弹射入“近代世界”的尝试。〔12〕也不能把它（除非在很次要的意义上）说成是为了对付西方或西方所造成的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更确切地说，它只是按照一支主旋律演奏出来的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而这支主旋律大约从 1850 到 1870 年之间曾在中国许多地区广泛出现过，同时从总体上说是对西方冲击到来以前的情况所作出的回应。应该不断强调的是，正如芮玛丽（Mary Wright）所说：“十九世纪中叶控制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内部的斗争。西方的冲击尽管从长远 十

分重要，在当时则知之者甚少。外国入侵只是一种地区性的骚扰与刺激，它只限于整个帝国东南边缘的五个港口。”〔13〕

其实，从另一方面说，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倒是对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由于叛军与基督教发生了联系，加上传教运动又四分五裂无法证明自己与这场起义无关，因此玷污了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形象。其次，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地域性或地方性的权力源泉，从而永远削弱了中央权力，使清廷从此无力对西方入侵作出有力回应。最后，太平天国和十九世纪中叶其他起义带来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中国的领导人误以为对这些问题已通晓，便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恰在此时，日本的领导人正在全力以赴地迎接西方的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反应“迟缓”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十九世纪中叶所面临的很不寻常的历史环境：内部事务万分火急，至于西方则可以暂缓一步。

改革运动

十九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清朝向何处去？”到了1900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中国向何处去？”在中间的这段时期出现了改革运动。这段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从第一个问题如何过渡到第二个问题这一角度予以描述。

但在描述这段过程时，我们必需力戒轻易地假定，把这次改革看成只是中西关系这个总范畴中的一个次范畴——认为它只是随着西方冲击才产生的现象，而且只有联系这种冲击加以了解才具有意义。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14〕

中国的改革志士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对西方做出反应，但是直到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西方问题才最后成为头等大事——而且即使到这时，有此看法的也只是很少数的学者和官员。七十年代之前十年左右，中国大部分改革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叛乱问题。实际上在同治时期（1862—1874）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消除导致叛乱的祸根，西方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如果中国能把内务整顿得比较像样，西方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对满族人来说，1860年秋天真是满目苍凉，暗淡达到极点。英法联军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势，占领北京，毁坏圆明园。咸丰皇帝一行风尘仆仆，避难热河。太平天国运动在五十年代后期似乎即将消声匿迹，可是随着李秀成死于1864年和洪仁玕一类领导的得势，又生气勃勃，卷土重来。统观全局，清王朝大有分崩瓦解之势。

但是，清朝竟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861年咸丰去世，为清廷出现新纪元铺平了道路，汉满两族协力支持朝廷。此后十年，占据政府要职的都是难得的贤才。外军在迫使清廷签署一系列新条约以后，撤离首都，返回南方，表示他们无意垂涎中国的领土。尤为重要的是，部分由于上述因素，太平军终于形势逆转，到1862年败局已定。

中国人曾把同治时期列为“中兴”，意指朝廷在最后时刻决心对整个体制的摇摇欲坠的基础注入新的生命力，以重新获得民众与绅士阶层的支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中兴，但这次中兴却有个特点，即面临西方入侵。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问题：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作出的回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需就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稍加说明。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innovative）不如说是“复旧”（restorative）。例如在文官制度方面

固然大家都认识到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但是所谓“才”则仍然沿袭旧意，指的是无所不能的通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深信只要政府选贤与能，制度上的改变是不必要的。同样，当讨论到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科举制度时，议政者最多只能遵循旧法，建议考试应注重文章内容而不应注重形式和书法。没有人做出任何努力吸收西学各种科目，使考试内容赶上时代。

在经济领域亦复如此。正如芮玛丽所有力证明的那样，在拟议的改革中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15〕}在农业方面不外削减皇室开支，增加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等等。对日趋严重的佃农问题，特别是亟待解决的农村减租问题，却无人过问。^{〔16〕}再者，大家仍然认为农业仍然理应是经济领域中唯一真正重要的部门。没有人对于像商业这类非农业活动课以重税，提出异议。另外对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阻力很大。这也可证明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后看的，复旧的。有影响的中国人很少有人同意外国人的看法，即认为扩大中西贸易将给中国提供繁荣发达的极好前景。中兴时期的领导人对经济增长这一概念始终无法理解。

不过有两个重要部门，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方路线进行改革。首先是对中国军队进行改组。太平天国的挑战暴露了朝廷正规军的腐败无能，另一方面英法军队的威力又戏剧性地显示了西方作战方法与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为了作出回应，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做出了相当巨大的努力提高中国军队的效率，并引进更加有效的训练方法。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的“自强运动”其目的是使中国的国家安全能得到保障。

中兴另一重要改革是在外交领域。对亚洲国家恢复了传统的以进贡为基础的制度，但为了对付西方国家，则成立了一个新的机

构 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 1861 年成立后 总理衙门就得应付成堆的难题，因为除了承担外交部门的通常工作外，还需掌握一套完全陌生的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体制，并向有抵触的中国民众证明政府对这种制度让步妥协是有些道理的。和它所面临的大量问题相比，到六十年代结束，总理衙门的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革新部门中都有一些情况冲淡了革新，使它显得不是那末激进。对中国来说，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 中国人曾经多次向‘夷人’屈尊就教 学习他们的作战技术。至于为了对付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部门，革新的色彩确实要更浓些。但是 即使在这一点上 也埋下一支伏笔 因为建立这个制度只是临时措施。恭亲王(1833—1898)及其同僚在力主建立总理衙门的奏疏中曾明确指出：“俟军务肃清 外国事务较简 即行裁撤 仍归军机处办理 以符旧制。”〔17〕

所以即使在中兴领导人采取革新的部门中，当时普遍存在的保守倾向也是很突出的。中国的改革家，除少数例外，仍然远没有认识到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芮玛丽对同治中兴曾作如下估计：“在中国曾出现过一系列努力，旨在改造政权到某一程度，使之一方面得以顺利参加近代世界的种种活动，另一方面又无需彻底改变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及体现这些观念的制度。同治中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中兴运动，就是这一系列努力中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芮氏主要论点之一是“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化要求和儒教稳定性的要求背道而驰。”〔18〕

对于这一论点可提出两点质疑。第一，同治中兴事实上是否失败了？〔19〕第二 假设中兴失败 是否如芮氏所说 是由于近代化与

儒教的要求相互冲突所造成？这些问题与中兴的改革纲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这一更加广泛的问题直接相关。因为，在中兴的改革中最明显的是由冲击造成的各部门，如外交、军事、与商业部门，恰好是在芮氏看来中兴成绩“最大”，而不是“最小”的部门。^[20]反之，同治时期改革成绩最小的部门正是与西方挑战关联最少的部门，如恢复富有成效的文官制度，重建对地方的控制，以及复苏经济等。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认为中兴在国内斗争中终于受挫，与其说是由于近代化与建立稳定的儒教秩序根本上水火不相容，不如说是当时大部分中国改革者不愿意（或不可能）理解近代化对他们自认为基本上已经熟知的老问题有何关联，能起何作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思想的重心依然落在中国的内部。

我们也许还可以就芮氏立论中所采用的概念本身是否正确提出疑问。首先用“儒教稳定性”这一概念来表述这段时期中国上层社会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是否妥当，有待探讨。对这一阶层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物，显然可以这样说。但孔斐力 (Philip Kuhn) 和詹姆斯·波拉切克 (James Polachek) 的著作提醒我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地方一级绅士的权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扩大。运动过后这批新的权力受益者仍然力图保持（如果不是加强）已得的权力，即使这样做使他们和中兴的其他目标直接冲突，也在所不惜。^[21]第二，即便对有些上层人物 或对所有上层社会的某些方面， “稳定”是首要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对他们是否把“近代化”本身看成主要威胁提出疑问。（不要忘记同治中兴的中心主题之一正是通过选择某些近代措施来支撑旧秩序。）我倒宁可认为他们心目中的主要威胁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这一点同治年间的改革家冯桂芬的情况特别具有启发

性。他在上海期间(1860—61)曾撰写了四十篇“经世”文章,题为《校邠庐抗议》。这些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的种种陋规弊政:官薪过低、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手续繁杂、卖官鬻爵、课税不均、有关回避(即禁止回乡做官)的规定以及为人所不齿的书吏、衙役组成的下层官僚机构等等。针对这些弊端,他提出一系列对策:以生员替换衙门书吏,通过书面投票选举村长,延长知县任期,建立下级办事机构以减轻知县无法承担的繁重公务。这些对策多受其师尊顾炎武(1613—1682)的启发,同时正如波拉切克所强调,也受他所代表的绅士阶层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影响。如果付诸实施,势必使中国地方行政的性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2]

冯桂芬的某些思想(特别是有关选举的规定)虽然有可能受西方影响,但两者之间的联系至今根据不足,无法确立。无论如何,冯氏本人却正如孔斐力指出的那样,一直宣称他的每个建议都多少可以从中国自己的变法传统中找到渊源。^[23]

冯桂芬的例子从两个重要方面启发了我们。首先,它对五十年与六十年代美国史家深信不移的一套假设直接提出挑战,这套假设认为中国体系制度的根本变化实质上就是“近代化”,而且这种变化既然必需吸收西方的思想与典章制度,就无法从儒家自己的思想天地内部演变产生(对这套假设本书将在第二章予以更加仔细的考察);其次,冯桂芬对自己的主张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至于当时士大夫的反应则更加小心翼翼。这足以说明在当时和以后多年内巨大的阻力不在于惧怕近代化,而在于惧怕根本性的变化。冯桂芬自己从未将他的《校邠庐抗议》付印,他的几个儿子在他死后才将其中刺激性较小的一部分刊行。该书全文直到1885年才终于问世。^[24]九十年代后期激进改革运动兴起后,经过光绪皇帝的亲谕,《抗议》一书才得以在中国官员中广泛流传学习。